

金宇澄

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读者往往比作者更专业

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细化的世界。

分工越来越细化,知识越来越细化。人类的知识被切割成具体的领域或专业,丢掉了一种完整性,但阅读要求也更深且高。

金宇澄说,在这样的知识境况下,作者要打动读者,将越来越难,这世界的读者,往往比作者更专业。在他看来,读者的文化程度和阅读需求提高了,那些学贯中西、眼目清亮、行走世界的读者,更是如此。



小说《繁花》 “我确实感受到幸福”

笔者:《繁花》看了两遍,金老师您是如何保持对寻常生活的热爱?您对于社会各个阶层、各个角落的生活都有着切身的体会,带领我们回到那个时代。从小摊小贩到车间工人,从各式服装到电影明星、流行歌曲,可以说您的观察,对生活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。

金宇澄:年轻时代我去东北务农七年,非常向往上海,生活细节完全改变,一切从头开始,

不能随便流动,没有未来,境况难以想象,上海小青年常常把上海细节作为聊天的重要话题。

上海离东北几千公里,因为远离,却变得分外清晰,仿佛“异地恋”,因为久别,对方就更清晰,更难忘,因为得不到。这代人的共同经历,以后产生了大量的“知青文学”,后来有一种说法企图否定它的价值: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应该是更苦的——我个人觉得,这等于讨论“先天

失明”还是“后天失明”谁更痛苦的问题。一般来说,你先是在色彩丰富的世界里生活,然后长期沉入到黑暗中,这个状态应该

是更痛苦的。笔者:如果把写作看成一个从构思到收获的过程,您是否在其中感受过幸福?此外,为什么我看《繁花》常常是看一点,停了几天后,不得不从头开始看?

金宇澄:谢谢。我确实感受到幸福,这是无意之间上帝赠予

的礼物。

建议随便看待这本书,很多读者觉得,翻开它任何一页都可以读,等到真有了兴趣,可以再从头开始读,我形容这小说是一个超市,读者可以随便选读,进入其中,你不会遇见那种老售货员,不厌其烦地为你推荐、介绍各种内容,这小说的内部,一切都由读者自己去判断。

金宇澄,《上海文学》执行主编,被称为中国小说界的“潜伏者”。他于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,著有长篇小说《繁花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迷夜》,随笔集《洗牌年代》等。

回顾与前瞻

“人就那么过来了”

笔者:老上海留给青春时代的您更多的是幸福还是伤痛?

金宇澄:一种感怀,意义复杂。时间已经流走了,听一首过去的歌,提起一个过去的故事,往往只产生复杂的感怀,像每一位年长者的回忆,人就那么过来了,青春时代有没有意义?《繁花》写的就是这些内容,等于有个朋友给我看一盘过去某个聚会的录像带,哎,我完全忘记这事了,完全忘了,意思就是这聚会对我的记忆是无意义的,但我一看带子,过去居然复活了,曾经的那些人和印象都复活了,引动我无数的感受,并不是幸福,也不是痛苦,这种重现,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感受。

笔者:现在很多人在说:科技向前发展,生活向后找寻。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?

金宇澄:认同这个说法,现实主义方式的作者,需要回顾,在积淀中寻觅主题,但也有前瞻式的写作样式,幻想的主题,对未来世界做出自己的想象和判断,向前迈进,写出将来的人物和背景。

笔者:身为电影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,请问金老师与王家卫导演的合作情况如何?具体是什么样的方式?

金宇澄:一直在进行中,准确地说,仍然在电影大纲状态,但是今年会有进展。电影是导演的艺术,王导有很多要求,目前我只能简单地说,是停留在好事多磨的一个状态。

(本版综合)

文学的生命 文学并未终结

笔者:张爱玲为何那么推崇《海上花列传》?

金宇澄:她说“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,没中断过,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,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。独有小说的新传中断过不止一次。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。”“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《海上花》。

《海上花》两次悄悄地自生自灭之后,有点什么东西死了。”什么东西死了,是这部小说继承传统小说的样貌以及采用了吴方言等等,形成了“断崖”。

笔者:好久没有看文学了。想到文学的终结这个问题,人们仿佛越来越理智化、越智力化、越数字化、越能用各种科学分析替代感性思考,

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?

金宇澄:我没觉得文学有终结的迹象,只感到这个世界的信息量,越来越惊人,越来越容易让人恐慌,这个国家的读者,文化程度越来越高——本土历史上,从没涌现那么多的知识分子、出版那么多的书,有那么多学贯中西、眼目清亮、行走世界的读者,他们

兴趣越来越细化,越来越显现细微的分类,比如“多肉类植物爱好者”,内中有更多的各自分类,这在过去都是不可能的事——对于文学作者来说,应明确地知晓这越来越细化的世界,对文学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,作者要打动读者,将越来越难,这世界的读者,往往比作者更专业。

方言 “单说‘方言文学的消退’不够全面”

笔者:在小说中怎么处理方言写作的度?既能表现语言风格又不令人难解?

金宇澄:这确实是个有趣的话题,方言小说要更大程度被读者接受,作者需要把握方言语词的分寸,举例上海话的“依”,也就是“你”,《繁花》是沪语写作思维,用这个第二人称常用词,每一页就会出现多次,不论上海/非上海读者,都是懂这个字的,但肯定不习惯,不喜欢,因此,我去掉了它——整部《繁花》,没有用“依”,我做了转化,比如改成直呼其名——上海人喜欢连名带姓直呼其名,也是

很有地域特点的做法——豆瓣有读者说,怎么连名带姓啊?读者却没有发现,这本书里从不使用第二人称词。

一些不通文的方言词,如沪语“豪梢”,意即“赶快”,就应该去除、取代,改成“快一点”就达意了,上海人也这么讲——在沪语同义词里,选出让华文读者适应的词来,去掉产生歧义的词;胡适先生赞《海上花》“我手写我口”,当时人怎么说都可以全盘照搬的时代,已经过去

了。笔者:在当下,普通话教育已经贯彻到整个国民生活的各个

方面,而方言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缩。请问方言文化的消退将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影响?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会有意识地应用方言文化?

金宇澄:因为普通话巨大的影响力,当代对方言的辨识度,听力,是远不如前辈了,这也是张爱玲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翻译它的原因,过去方言混杂共生的语境,已慢慢过渡到了一种共同、单调的普通话环境里,原版《海上花》慢慢也就看不懂了——等于如今去到任何城市,建筑都差不多,没话语的特点了,普通话对于沟通管理是好

的,文学首先却是要讲究语言的魅力,因为读者第一时间面临的

就是作者语言的特点,西方文学同样注重方言,讲究的就是“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”,其实普通话是一种人造的语言(“以北京方言为基础”所产生的普通话),也很容易形成文字语言同质的现象,方言却是水土的自然生成,永远那么生动。

当然,单说“方言文学的消退”不够全面,北方语系的方言,北京话、东北话,陕西山西等等方言的文学,完全是一直在蓬勃继续里,主要是江南语系,包括闽、粤这一范围,缺少书写者。